

# 澳門主教高秉常（1976-1988）

安文哲\*

以紅衣主教高若瑟<sup>1</sup>在1976年1月23日發表的一番幾近預言的話語來說，高秉常主教注定要成為“歷史上，東方保教權的最後一位教長”。<sup>2</sup>事情果然如此，他也是澳門的最後一位葡萄牙籍主教。教會是普世和本地性的，其職能不分種族。然而，人口環境中佔壓倒性多數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強迫作出其他的選擇。順便要說上這麼一句。

高秉常主教是亞速爾群島皮庫島的聖馬特烏斯人氏。1924年7月8日，他出生在那裡。可喜可賀的是，這位澳門的名譽主教仍健在。在處世方面，他為人謙虛<sup>3</sup>，誠為楷模。他於1938年抵達澳門，目的是進入聖若瑟修院，完成他的神學訓練。而後數年是使澳門刻骨銘心的那些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子，因為澳門接納了成千上萬，且真正改變了澳城面貌的難民。在此，無論是葡萄牙政府或教會，還是慈善人士都在積極行動，慷慨解囊，譜寫了一首真正的慷慨與人性的讚歌。高秉常主教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痛苦地說：“凡是在此經歷了那些多災多難的日子的人，都知道，這片土地不止一次地被肆虐我們周圍的火災所摧毀。然而，當一切似乎將消失殆盡時，最後時刻出現的奇蹟一幕挽救了局面。歷經磨難，人們幾近絕望。這個城市，這個具有四個世紀歷史的教區經歷了多少回？”<sup>4</sup> 亞速爾籍澳門

---

\* 教員、研究員及數部有關澳門歷史作品的作者。

1. 關於澳門這位重要的公眾人物的最近研究，可見黎祖智：《高若瑟——澳門功勳市民》，澳門國際研究所，2008年；若澤·瓦雷·德·菲格雷多：《一位東方使徒——略論紅衣主教高若瑟之生平與著作》，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安文哲：“高若瑟思想中的中國”，《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局，第41期，2013年，第125-150頁。
2. 托馬斯·貝當古·卡多佐神父統籌：《高秉常主教文選》，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23頁。
3. 托馬斯·貝當古·卡多佐神父引用了這一事件：“當他當選時，聖若瑟修院的一位女傭人開始叫他神父主教（Sanfou ChiCa）。以前只稱呼神父（Sanfou），後稱為神父主教（Sanfou ChiCa）。實際上，他並未稍有改變他的生活方式。繼續住在隔壁的神學院中。他的房間很樸素，如同我住的那間一樣。面積只有4×4米。”同上，第21頁。
4. “澳門教區禧年典禮”，《澳門教區月報》，第853期，第178頁，1976年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48頁。

作家賈樂安在《伊琳娜·奧斯特拉科夫的安魂曲》<sup>5</sup>中，以真正小說的形式，為我們描寫了這樣一群為戰爭所迫、所亂，湧向澳門的生命。他們的命運總是籠罩在一片神秘和痛苦之中。

高秉常主教於1949年10月晉升了鐸品。此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他開始了繁忙的傳教和傳播福音的工作。他這樣告訴我們，“傳播福音不只是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溝通一生。”<sup>6</sup> 於此同時，他深化了他的語言天賦，學習了漢語、拉丁語、德語、意大利語和法語。他被任命為聖若瑟修院院長（1961-1966）。在那裡，他教授拉丁文、哲學、法語和教會法。他還在香港仔的香港教區的大修院任教（1968-1973）。

對青少年的道德和宗教教育總是出現在這位教育家的視野中：“親愛的年輕人，你們的完整教育也還包括道德和宗教層面。通過經常參加宗教與道德課程，你們要不斷深化它。從你們自身的經驗中，你們會體會到，真正的宗教會使人超脫和完美。就像造物主是真理、自由和完美的表現那樣。”<sup>7</sup> 因為只有了解情況，人們才能非常精闢地設計自己的想法：“預防毒品和其他許多人令人墮落的惡習的最好解藥仍是一種良好的基督徒培養。這方面的粗心大意是如此之多，實在令人遺憾，且廣為人知。澳門的道德環境並不是最有利於良好習俗的保持。因此，需要進行良好的道德與宗教培訓。這樣才能使青少年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具有更大的抵制不良誘惑的能力。”<sup>8</sup>

在羅馬的教廷大學，他獲得了教會法學士學位。在教區事物的掌管中，擔任越來越多的責任，曾擔任澳門主教管區總管和代理主教。

5. 於1993年由東方文萃出版社在澳門發行。1994年，這部小說獲東方葡萄牙學會獎。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澳門為中心，如1994年的《帝國的創建者》；《為陛下效勞》，1996年；《伯爵先生及其三個女人》，1999年；《母親》，2001年，以及《約蘭達的故事》，2005年。

6. “澳門教區四百週年主教文告”，《澳門教區月報》，第850期，1975年，第513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39頁。

7. “關於天主教教徒學在宗教與倫理班註冊的主教文告”，《澳門教區月報》，第918期，1981年，第77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139頁。

8. 同上，第138頁。

1976年，教宗保羅六世委任他為澳門主教，以接替他的同鄉戴維理主教。<sup>9</sup>十二年後的1988年，他卸任。澳門教區迎來了過渡時期。他的自動辭職被理解為一種明智之舉。他以這些精準的言語，對澳門的天主教社團<sup>10</sup>說：“眾所周知，羅馬教廷一直以來長期奉行傳教地的教會本土化的原則。為了服從這個標準，主教盡可能開始從當地神職人員中選用，以逐漸取代來自歐洲或其他地區的主教。例如在鄰近的香港教區這樣做了。目前的大主教是第三代華人教長。台灣、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的情況也是如此。甚至港澳的聖公會教區也採取了同樣的路線。幾年前，他們推舉了第一位華人主教。面對此種情形，澳門受其條件限制，一直是個特殊情況。

這種情況，考慮到前面講過的這些原因，特別我們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可以再無限期地延長……當我離開澳門主教府時，我心中只有一個遺憾：未能為該教區做得更多和更好。無論在何處，遠近與否，澳門時刻在我的記憶中，永遠在我的心中。50年前，我作為一名神學院的學生來到了澳門。最令我感到喜悅的是，我看到了它的繁榮與進步，尤其在宗教領域，大獲全勝般地做好了迎接未來挑戰的準備。”然後，他回到了亞速爾群島的皮克島，直至今日。他的繼任者是林家駿主教。<sup>11</sup>

他的工作很快為他帶來了回報。1986年，澳門東亞大學<sup>12</sup>授予其“榮譽博士”學位。1984年，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授予其功德高級軍官勳章，1988年又授予其攻功績大十字勳章。他故鄉的亞速爾群島地區立法會，在2012年授予其自治區傑出成就勳章。我們不知澳門政府是否向其授勳。

他的主要教義著作由托馬斯·貝當古·卡多佐神父在1999年結集出版。題為《高秉常主教文集》，匯集了各種散見的文章，由澳門基金

9. 1961-1973年間，出任澳門主教。

10. “致澳門天主教徒”，《澳門教區月報》，第998期，1988年，第72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255頁。

11. 1988-2003年間，出任澳門主教。

12. 有關東亞大學改為澳門大學歷史的概述，請參閱黎祖智：《澳門大學25週年》，葡中英三語版，澳門，澳門大學，2009年。

會出版。托馬斯·貝當古·卡多佐神父的工作，還值得特別關注，因為它對高若瑟<sup>13</sup>、若澤·維埃拉·阿爾維斯<sup>14</sup>，鮑理諾<sup>15</sup>和海梅·加西亞·古拉特<sup>16</sup>文集的整理工作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位具有魅力的亞速爾群島的“遊說者”的很大部份培訓是在聖約瑟修院完成的。它尤如葡萄牙在東方精神世界群島中的一小島。

我想邀請我的讀者陪我重溫高秉常主教思想的三大核心理念。務實和人性，再加上基督教倫理和基於信仰的人生喜悅。他摒棄那種牧函的頭頭是道，而是發表了深刻、斷然和令人深思的“文告”。這更貼近問題。隨著筆者的文字，我們來作一尋覓詮釋和發現之旅。

第一個想法在於歷史教育和歷史智慧給予我們的訓導和影響。1978年，在紀念1903年由鮑理諾主教創立的《澳門教區月報》75週年之際，他寫道：“作為一本教區雜誌，《月報》超越了狹窄的地域限制，在普世教會領域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因為它涉及差會歷史的部份。它從被人遺忘和時間侵蝕的檔案中，恢復了一些關於東方教會的活動有價值的文件，供學者使用。這本雜誌所做的工作得到了所有對教會在這一地區過去的傳教工作感興趣的人的讚許。”<sup>17</sup> 雜誌的主編是文德泉神父。他是位名人，著名的歷史學家。尋根意味著，除了考慮到歷史性的弱點，想著所有的感覺和精神與物質的發展趨勢：“現代生活的舒適可能會阻止我們評估先驅們所作出的壯烈犧牲。是他們乘坐著小小的三桅帆船，穿洋過海，經過漫長而艱苦的旅行，來此創辦了教會。他們中許多人曾殉道，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緩慢的自焚過程，投身傳教工作的艱辛和疲勞。但這些努力沒有白費。當今在整個東方蓬勃發展的天主教社團，在很大程度上，是四個世紀前的開拓者帶來了的福音胚芽的成果。澳門的天主教社團便是碩果之

---

13. 1920-1941年間，出任澳門主教。

14. 1948-1951年間，出任科欽主教，1953-1961年間，出任果阿和達曼大主教。

15. 1902-1918年間，出任澳門主教。

16. 1945-1967年間，出任帝汶帝力主教。

17. “慶祝一個日子”，《澳門教區月報》，第882期，1978年，第288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90頁。

一。”<sup>18</sup> 它是對往昔的承認，似乎在為現實和未來保駕，給予鼓勵，不斷開闢未來權利的週期：對於那些居住在澳門的人而言，我們傳教士的過去不能被忽視。還有聳立的三巴牌坊，還有聖若瑟修院提醒著我們耶穌會傳教士的偉績，無疑，他們是我們偉大的東方福音的傳道者。現存的加思欄兵營令我們緬懷方濟各傳教士。那裡是他們的傳教中心，將福音的佳音傳播至遠。還有玫瑰堂，紀念著多明我會宗教人士傳播福音的工作。聖奧古斯丁教堂喚起了人們對奧古斯丁教派在澳門及遠東差會活動的緬懷。虧得這些福音佈道者，一批又一批的世俗神職人員和其他宗教團體的傳教工作，從傳教的母地教區——澳門不斷分出去了新的教區，分佈在遠東廣袤的地區，從帝汶到日本。<sup>19</sup> 這個昔日的記憶一個又一個，豐富而多樣。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還有那些在那裡生活了多年的外國人的共同歷史。

第二個想法側重於對當代社會之非人性化的思考。考慮到科學理性和客觀性的價值，尤其是科學和技術問題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無可否認的是，科學技術通過對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使用，使人擺脫了諸多限制和依賴，但是這一進展必須伴之以同樣的建立在仁愛之上的道德和精神的進步。否則，這些釋放出來的力量，由於所產生的失衡和模稜兩可，將造成新的奴役（參見《創世紀》，8-9，10）。當今的世界受到了自我毀滅的幽靈的威脅。這便明確表明它是真理。”<sup>20</sup> 反擊粗暴的技術、技術專家和技術官僚的同流合污的辦法之一，難道不就是在靈性、文化和宗教之間建立兄弟般的對話嗎？這是否足夠呢？正如德國思想家卡爾·奧托·阿佩爾指出的那樣：“人的情況是人類的道德問題。”<sup>21</sup> 可以在這番激進的言詞中，看到高秉常主教的基本思想：“如果人具備知識成為必要，勢在必行的是他必須是好人。言

18. “澳門教區四百週年主教文告”，《澳門教區月報》，第850期，1975年，第513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38頁。

19. “澳門教區禧年典禮”，《澳門教區月報》，第853期，1976年，第178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48頁。

20. “聖誕節賀詞”，《澳門教區月報》，第934期，1982年，第4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156頁。

21. 《討論與責任》，巴黎，克瑟夫出版社，1996年，第21頁。

之有理，所有的人必須上體育課。倫理和人性的培養則並非如此。為何？學生的道德誠信難道沒有他的身體健康重要？<sup>22</sup>

第三個想法同聯合聲明簽署前，與中國的關係和教會的立場的政治關係有關。一開始，他就明智地指出：“與人們有時的說法恰恰相反的是，澳門教區從未在宗教的影子裡面搞政治。”<sup>23</sup>他甚至還強調：“我們來此的目的不是主宰，而是服務。我們帶來了人類信仰基督而產生的普世仁愛的佳音。”<sup>24</sup>的確，一再堅持是有目的的，所以宜記住，“不是教廷羞辱了中國，向她發動了戰爭和強加了不公平的條約。然而，一些歷史事實促成了教會在一些中國人的眼中，被視為與西方侵略者的同謀機構。我們主要是指在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天主教傳教士是法國特殊保護的受益人。”<sup>25</sup>1985年，他受宗教事務局的邀請，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次基督教兄弟般的朝聖之旅……。所有人努力給我們解釋天主教會在中国的狀況，包括與政府的關係……就我們而言，我們不失時機地強調我們教區的具體情況：一個由葡中兩種異質文化構成的社區。我們強調基督的兄弟情誼如何將不同的人成功匯聚一個教會內，建立了一個真正的基於互相尊重每個群體的文化認同的統一體；因為除了傳播福音的本職工作外，我們都致力於服務社會，特別是通過學校和社會保障機構；我們的教區如何與許多世界各地共融，跟他們發生了相當數量的人員和物質的交流；如何在澳門並肩工作，有華人和其國籍的傳教士；我們的教區如何與聖伯多祿的繼承者和普世天主教會的牧人共融”。<sup>26</sup>1997年時，他對不久的將來的理解便是基於這些參數，“由於在中國既定的政治目標中，中國的利益是維護這兩個地區的穩定，可以相信，北京不會陷入遏制這兩個飛地的宗教自由的誘惑，將中國內地的

22. “主教文告”，《澳門教區月報》，第929期，1982年，第104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153頁。

23. “澳門教區禧年典禮”，《澳門教區月報》，第853期，1976年，第179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49頁。

24. 同上，第180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49頁。

25. [亞速爾群島]《義務報》，1997年8月14日。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298頁。

26. “澳門主教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告示”，《澳門教區月報》，第966期，1985年，第61頁。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195頁。

政策強加給他們。在中國，教會是由所謂的三自愛國會和政府控制。這種狀況可能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因而對我們欲保持的繁榮產生負面影響。這是對這兩個前殖民地和平與自由的未來進行推測的教會的推理。一方面，邏輯和常識似乎贊成這種觀點。另一方面，“有游離於純邏輯之外的情感因素。之一便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某些西方列強國家對這個國家所犯下的不公正對待可怕地傷害並加劇了該國的民族主義。我主要是指上個世紀發生的鴉片戰爭和英國人佔領香港島。西方以非正義的戰爭和不平等的條約使中國蒙受羞辱，可恥地利用了當時中國人的軟弱。這些令人髮指的冒犯令中國人難以忘懷。無法預測中國的民族主義影響事件進程的尺度。此外，東方的邏輯並不總是與我們的邏輯一致。因此，當我們預測港澳教會的未來時，要有所保留。”<sup>27</sup> 這種在處理國際文化關係中所表現出來的觀察問題的遠見卓識，是高秉常主教的一種天性。當然，這幫助他消除了一些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歷史衝突與誤解。這是一種葡萄牙人處世的藝術，加上普世對話和寬容精神才能做到了所做的一切。

---

27. [亞速爾群島]《義務報》，1997年7月24日。再刊於《高秉常主教文選》，第297頁。

